

# 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实况及其意义

马泰祥

**内容提要** 日据时代台湾的顶尖日语作家,在1930年代以后通过参与日本本岛的“文学评奖”而博得日语文坛的青睐,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其熟练掌握了殖民者语言的证据。但是通过对日本本岛文学评奖实况的分析,以及还原彼时台湾文坛的文学批评生态体系中对台湾日语作家创作语言能力的评价,则可以发现,此时台湾顶尖日语作家运用日语进行文学表现的能力其实颇为可疑。对台湾日语作家日语能力的真实状况进行剖析,首先可以揭示殖民地台湾总督府所引以为傲的日语普及与所谓“国语运动”貌似颇有成效,但实绩有限;其次展现出了日本本岛文坛与殖民地文坛之间的那种不平等的文学交往意态;最后还证明了过分夸大日据时代台湾文坛“日语”的绝对支配地位也是不甚牢靠的。

**关键词** 日据时代 台湾日语文学 吕赫若 张文环 龙瑛宗

马泰祥,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400715

进入1930年代以后,受制于殖民地文教制度、日语普及等文化规训政策,“日语”逐渐成为了彼时台湾文坛的通用语言。在此种语言生态系统中,日据台湾作家的文学思考也不能不发生变异,开始聚焦于怎样以日语创作水平的提升,来确认台湾本岛文化的升格。是故,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最顶尖的几位日语作家——杨逵、吕赫若、张文环以及龙瑛宗,就不断以日语创作投稿到日本本国的文学刊物上,或参与文学评奖、或谋求创作发表,发出向日本“中央文坛”进军的号角,并获得了巨大成功<sup>[1]</sup>。

在这种巨大的成功背后,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当台湾的日语作家或凭借着对殖民地台湾的在地化书写让“中央文坛”的确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或依靠跨区域左翼文学的创作而打动在“中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论》(13JJD750009)阶段性成果。

[1]自1934年开始,台湾日语作家就陆续开始在日本“中央文坛”亮相。这一时期被日本文艺刊物登载的台湾作家日语小说有:杨逵《送报夫》(《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1934年)、吕赫若《牛车》(《文学评论》第2卷第1号,1934年)、张文环《父亲的面面》(《中央公论》小说征文选外佳作,1935年)、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改造》杂志第九届日本悬赏小说佳作奖,1937年)等等。

文坛”的左翼作家领袖的嘉扬之心，“实力”、“机遇”以及“情面”的结合，使得这一批日语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迂回地取得了日本本岛文坛的认可。可是这些来自“中央文坛”的青睐，是否全部出于对台湾日语作家文学艺术水准的首肯？在“获奖”与“受关注”之外，以顶尖的日语作家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等人为代表的台湾日语作家群体，他们的日语文学的创作水平，或者说其文学语言——日语的文学表达能力究竟程度如何，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了。

## 一、“实力”、“机遇”与“情面”：日本“中央文坛”文学评奖之实况

台湾最顶尖的日语作家，通过新兴的文学制度——“文学评奖”，已经至少确保自己的文学声响为殖民中心的日本“中央文坛”所知，这一文学事实是没有疑问的。台湾的日语作家以日语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从而获得日本“中央文坛”认可，这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进阶目标。其文学上的终极指向，乃是以日语文学创作作为提升台湾文化的资本，最终达到“启发文化、振兴民族”的“文学职务”的实现。

在表面上看来，1934年至1935年间杨逵、吕赫若在《文学评论》的亮相，张文环获得《中央公论》的肯定，以及1937年龙瑛宗斩获中央文坛最具盛名的《改造》杂志佳作奖，从这些“文学评奖”的事实似乎可以得出台湾的文化随着台湾日语作家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已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建设阶段。的确，如果台湾这一批日语作家凭借自己的文学艺术水准的拔尖来攻城略地，与日本本国作家相互竞争而占有日本“中央文坛”之一部分作为言说根据地，那么他们笔下的台湾殖民地经验，的确可以说在日本岛内文学生态中据有了重要位置，使得台湾的文化建设从此提上了一个新台阶。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一批台湾最顶尖的日语作家，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央文坛”留下文学活动的足迹，他们日语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并非是助力于其实现希望的绝对砝码，甚至于他们的文学表现语言——“日语”的遣词表意、抒情状物的表达能力，在日本文学界看来都很难达到“标准水平”，遑论与日本本土作家“对抗”、“竞争”。“文学评奖”背后所隐含的一套运行规则，给了这一批日语作家抒发自己身为“殖民地子民”思考、感想的机会，他们略带“伤痕”的日语作为文学语言来描写殖民地众生相，亦坐实了殖民地宗主国“中央文坛”对殖民地生活意态的本质主义想象。

以杨逵为例，1934年获奖作品《送报夫》可谓他作家生涯的代表作。这篇小说的获奖，也为他在日本“中央文坛”积累人脉关系奠定了基础。但《送报夫》的获奖，似乎更多是小说艺术水准之外的其他因素。新兴的文学制度——“文学评奖”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比赛”，“评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典范确认、文学路径指引等潜在因素，决定了“评奖”本身不会完全依照文学水准的高低来排座次。如何通过“文学评奖”这个中介手段，使得在此文学场域中的文化动向按照评奖者所代表的文学权威的冀望而发展，并以合理的方式调动评奖参与者的情绪、评判参与者的文学建设路径是否合乎人意，就成了“文学评奖”特别是殖民宗主国“文学奖”的真实状况。杨逵《送报夫》在《文学评论》推荐奖甄选中，就是因为杂志核心人物德永直非常激赏作品中左翼国际主义联合的思考理念，对此大力背书，终于使得这篇小说抡元夺魁<sup>[1]</sup>。在《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上，曾刊载出评奖专家对于这篇获奖小说的评审意见，从中可以读出六位评委对这篇小说艺术水平的真实看法：没有一位赞赏《送报夫》这篇小说艺术水准出类拔萃的。中条百合子表明“其需要更高层次的艺术化，但对目前的作者而言是不可能的”，龟井胜一郎指出这部作品“有写作手法上的生硬不自然，或者构造上的生涩”，窪川稻子直言“这无法说已经成为一篇充分的小说”，甚至连德永直自己也承认“这篇小说，严格说来并非杰作。甚至可

[1]张季琳：《杨逵的〈送报夫〉在日本的得奖及其文学意义》，载赖泽涵、朱德兰主编《历史视野中的两岸关系（1895-1945）》，[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以说还不能算是小说”<sup>[1]</sup>，如此说来这篇小说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半成品，无法被视为佳作，但这些评委稍后的辩白补充以及自圆其说，展示出了面对殖民地作家的日语创作时，那被轻轻搁置的文学评赏价值尺度。中条百合子尽管觉得小说艺术化程度不够，但小说作者“真情洋溢”、“不如就接受其中好的部分来读它”；龟井氏则直言小说在艺术上的缺点反而是其特别的文学素质：“毋宁呈现这种未完成的美会更好”；藤森成吉最后一语道出《送报夫》的获奖机由，根本是因为其“殖民地”背景以及“左翼”题材的叠加，使得评委设法降低了文学评判的尺度标准：

关于《送报夫》中不能轻易忽视的事实，足可为其旁证的感情的强度，以及因为形象化不足而呈现的缺憾。如果说对于劳动者农民的作品，必须以宽大的尺度看待；那么对于殖民地的这类作品，就必须更加宽容对待了。<sup>[2]</sup>

是故，对于其时台湾日语作家参与“文学评奖”并获奖的实况进行分析，其实是为了提醒注意如下事实：“文学评奖”所带有的文学制度化倾向，使得其在运作过程中，不仅不会甚至无法单单考虑作品的文学艺术水准，而背后往往带有其他层面的价值评判尺度。台湾的日语作家通过“文学评奖”获奖，的确可以看到他们得到了“中央文坛”的文学认可，他们建设台湾文学之路也得到肯定，但不能也连带地认为，台湾作家的“日语”文学语言操持能力，也与“中央文坛”并驾齐驱了。在事实上，这几位最为顶尖的台湾日语作家，在台湾文坛文学评论生态中，不断被指摘为运用日语进行文学表现的能力欠佳。最顶尖的台湾日语作家姑且如此，其他的台湾本土日语作家的日语水平也就可见一斑了。

## 二、台湾日语作家的日语能力实况

对于台湾的日语作家而言，他们的母语毫无疑问都是汉语中的台湾区域方言（如闽南语、客家话等），而日语则是其在殖民教育体系的学习过程中后天习得的第二语言。采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是其时殖民地作家无可奈何的现实情状。就台湾的日语作家而言，其日语的养成“得益于殖民地“公学校”的日语教育，是所谓其时“国语”（即日语）普及所造就的结果。“公学校”的日语教育、台湾社会普遍的“日语习得”风气，的确可以说造就了台湾作家在成长阶段的“目的语学习环境”。周婉窈在分析“皇民化”时期台湾日语普及运动——所谓“国语运动”的实效时曾指出，“在日语教育家看来，台湾人的日语充满缺点。综而言之，这些缺点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敬体与敬语的误用，其二是日语台湾化。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是普遍的现象，但对以保存日语纯粹性为职志的殖民地教育家而言，实有难以接受之处。”<sup>[3]</sup>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包括台湾作家在内的所有台湾民众学习日语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缺点”，都来源于台湾人母语对“二语习得”的负迁移作用（negative transfer）。汉语台湾区域方言（闽南语、客家话）与日语两种语言之间，在对比分析中的异同存在着“等级”，也展示出了两种语言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巨大的差异又直接构成了“二语习得”上的难度，因此台人的日语习得成效不彰，或误用“敬体与敬语”，或“日语台湾化”，往往为日人教育者诟病。

这种情况在语言文化精英——台湾日语作家身上同样存在。包括龙瑛宗在内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一众台湾顶尖日语作家，在台湾与日本本国的文学批评生态中能获得肯定并非因为其日语能力堪与日本内地作家媲美，恰恰相反，他们一再被评论家指摘其日语能力有缺陷。在杨逵主编的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中，他在第1卷第9号中曾以杨建文署名发表小说《顽童伐鬼记》（「鬼征伐」），在接

[1][2]德永直等：《关于〈送报夫〉》，载日本东京《文学评论》第1卷第8号，1934年10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1册，〔台南〕“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第104页，第105页。

[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0页。

下来的一期中,陈永邦就立即对杨逵的这篇小说进行了适时评论,将这篇小说创作与日本“内地女作家”英文夫的小说进行了比较。两位作家的小说都是以日文写就,日语语言能力的优劣高下立判:“杨建文的《鬼征伐》……和前述英文夫的文章比较起来,似乎还有一大段距离,简直就像牛车在乡间小路上慢慢走那样”、“我也不太喜欢——具体列出,可是二十页开头五行,健作的姐姐(笔者按,此为杨逵小说中的人物)那些对话实在糟透了。举个实例来说,不管任何人用音读读出这五行,都会被其中连续的‘的、的、的’吓坏了吧!写不出纯熟的美妙文章之前,我们的文学终究不可能获得高度评价”、“深藏着一种还没有完全熟悉日文的‘余忧’”。像杨逵这样公认的台湾文坛主力军日语能力尚且如此,此类没有完全熟悉日文的“余忧”显然制约了台湾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其解决之道毫无疑问就只能是想方设法提升台湾作家的日语水平了:“我们本岛人先天不足,即使努力想写出完美的日文,也还是无法达到理想境界,这是人人都有共同的烦恼。我们本岛人是新附民,当然很难期望一朝一夕就能意到笔随,尽情挥洒日文。尽管如此,我还是苦口婆心地期待,现在只要稍微用心写文章,或许就能有更好的成果。”<sup>[1]</sup>

其他几位台湾顶尖日语作家的文学语言能力也同样受到苛评。张文环与吕赫若虽然被肯定为台湾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但在日本作家中山侑的心目中,他们的日语能力仍亟待提高,“张文环、吕赫若,似乎都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多产作家。……非内地人的外地作家,最初同时也是最大的文学体验,就是如何学好日文,而且还得毫不稍懈地努力。不过,好好学习日文还是有所不足,必须以日文学习为媒介,同时完全体悟日本精神不可。翻看吕赫若的《财子寿》、《庙庭》,以及张文环的《顿悟》、《阉鸡》,就知道这两位欠缺的是怎么了。”<sup>[2]</sup>日人明取勘助评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时,虽然主观上肯定小说在语言风格上的异质性,换言之也间接承认了作家的日语能力有缺陷,“但在对日文并不娴熟的这位作家的笔触下,形成那种文体的会话,反而有种奇妙的新鲜感”<sup>[3]</sup>。就连曾留学东京、颇以一口流利东京腔自负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在日本评论家眼中也未尝不是日语“三脚猫”:“周金波的《乡愁》是一只散发幽光的灵魂,一只极度孤独的诗魂。可惜他的国语也太蹩脚了一点。”<sup>[4]</sup>另一位写出“皇民文学”代表作《道》的陈火泉,尽管备受日人西川满青睐,但其日语水准连西川满本人都无法直视:“前半部分我是边读边摇头,因为文字太粗糙了,助词的错误也很多。然而,到了后半部分,连我的眼眶也湿了。这才警觉,多么好的作品哪!”<sup>[5]</sup>

对台湾作家日语能力实况的深入分析似乎可以断言,即使对于被视为台湾文化先锋、社会菁英的台湾文学家而言,他们的日语程度其实并不能被认定为绝对超拔于一般台湾民众之上,达到堪与日本“中央文坛”相提并论、平等竞争的水准。台湾日语作家的日语习得路径与一般台湾民众的日语修得方式无二,公学校中的日语教育以及“国语运动”时空氛围造就了他们的日语基本能力,再加上在这之后的赴日留学,使得其日语能力再上层楼(但仍有不少作家如龙瑛宗、吕赫若在青年时代并未有日本

[1]陈永邦:《余忧——评〈台新〉十一月号》,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1936年10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2册,第257-259页。

[2]鹿子木龙(中山侑):《作品与文章——论如何提升散文品质》,原载《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1942年10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3册,第412页。

[3]明取勘助:《小说月评》,原载《新潮》第34卷第5号,1937年5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2册,第295页。

[4]宝泉坊隆一:《文艺时评——以〈文艺台湾〉四月号为中心》,原载《台湾艺术》第4卷第6号,1943年6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4册,第190页。

[5]滨田隼雄、西川满:《评小说〈道〉》,原载《文艺台湾》第6卷第3号,1943年7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4册,第220-221页。

留学经验)。总体而言,他们比一般民众的日语水平显然高出不少,但他们的日语语言能力的“高度”只是在全体台湾人的“比较空间”里拔尖,一旦将他们的日语创作纳入到同日本母语作家的“比较空间”里,他们的创作往往被日本本土作家找出各种各样的“语言伤痕”。在分析台湾日语作家的创作时,不能不考虑到他们日语语言能力的实际情况。

### 三、日据台湾作家日语能力实况背后的“潜问题”

对日据台湾日语作家语言能力的述析与评鹭,并非纯然是为了指摘殖民地台湾作家的日本语文学水准与语用能力。关于台湾作家日语创作的语言能力实况的分析,实际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寻求平衡点的尝试:完全无视台湾日语作家日语语言能力的欠缺,会导致在研究中无意识地“顺从”殖民者语言霸权生态的发展体系,将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与日人日语创作等量齐观,而无法发现台湾日语创作在文学语言“欠缺”的背后所蕴含的殖民情感、文化内涵;而过度强调台湾日语作家日语能力的短缺、不足、充满“伤痕”,则又似乎暗示着殖民地作家创作上的先天不足,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文学“残次品”,这又陷入了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以历史后见之姿看待前辈作家创作的窘境。当下再来研判“殖民者语言在殖民地成为文学创作语”这一问题时,必须坦承殖民地作家的文学创作语言能力确有不足,并且还需要深入分析这种不足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问题:这种文学语言能力的偏移、差异,在“台湾文学”本位的研讨范畴内,究竟有什么意义。

首先,台湾作家日语能力的实况毫无疑问地展示出了1930年代以来台湾所谓“国语运动”的真实普及情况。台湾总督府以台湾子弟为日语教学对象的“公学校”的设立,使得自1905年至1930年间的台湾学生,就学于“公学校”者逐年增加,辅以遍布全岛的“国语讲习所”等日语普及机关,开始大力倡导日语普及运动。殖民总督府认为“国语运动”成就非凡,实现了既定目标。台湾社会中“日语理解者”之比率,从1905年的不足0.38%逐渐攀升至1931年的20.4%,而在1941年日语理解者更达到了57%这样一个规模<sup>[1]</sup>。但是,“日语理解者”比率的提升,是不是就意味着“日语普及”的目的达到了?此阶段台湾民众实际的日语语言能力究竟如何?日据台湾作家整体较之一般百姓而言,应属社会菁英,他们在教育水准、文化修养上显然更胜一筹,其日语能力也应该是突出于一般基准的。从他们的日语表现的实况入手,可以一窥殖民地台湾“日语普及”的真实情况以及作用效果。与“国语运动”铺天盖地的推行相呼应,台湾作家被动员多多采用甚至仅仅采用日语来进行创作。在历经了多年的“苦战”,尽管殖民总督府不无欣慰地宣布1940年代的台湾“国语国解者”已经突破半数<sup>[2]</sup>,这些“国语理解者”的真实日语水平即便无法用客观的数据指标来衡量,但单单参考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能力实况,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其次,台湾作家日语能力的实况还展示出殖民地宗主国“中央文坛”与殖民地地方文坛之间那种不平等的文学交往关系。在文学评论层面,殖民地母国文坛在鉴赏殖民地作家创作时,流露出强烈却颇具隐蔽性的文学沙文主义。如前所述,台湾作家日语文学语言能力上的不足,在日本作家眼中尽管格外触目,但台湾作家的殖民地子民身份,在日本“中央文坛”的眼中,则这些文学上的不足之处,竟然也有了特别的存在价值:“毋宁呈现这种未完成的美好”。为肯定这些“特别价值”,日本的“中央文坛”还设法降低了评鉴这些创作的文学标准:“对于殖民地的这类作品,就必须更加宽容的对待了”。在表面上看来,这可以说是对台湾日语作家用心良苦的变换着方式的肯定,是一种额外的“法外施恩”,但实际上此做法无疑坐实了台湾文坛身为殖民地,与宗主国“中央文坛”之间那种深刻的不平等关系。

[1][日]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张季琳译,[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45-46页。

[2]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5页。

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先于日本“中央文坛”成名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成为了台湾作家念兹在兹的文学偶像,杨逵等作家在日本本岛文坛夺得奖项,即在台湾岛内引发轰动,被视为“我们台湾的张赫宙”诞生<sup>[1]</sup>。这一事实显示出在其时台湾文学界中已经形成一种以“张赫宙”为日语创作奋进目标的特殊情结。但是台湾作家的这种“张赫宙情结”,却在无形中暗示了殖民地处境下挣扎求发展的台湾日语作家与生俱来的“低人一等”,即眼前的目标只能是同为殖民地下“次一等”的朝鲜日语作家张赫宙而非某个日语本岛的母语作家,以及这种“低人一等”的进阶目标——与日本“内地”文坛平等对话的权利。

最后,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实况,还展示出在日据台湾文化场域中的文学语言大环境——“清一色的日语世界”下日语优势地位的不牢靠。过分夸大日据时代台湾文坛“日语”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与文学场域中的创作实情迥不相侔的。“清一色的日文世界”的说法,源自日本学者下村作次郎,他认为“到了一九三七年,台湾岛内的报章杂志被禁止刊载汉文栏,也就是被禁止使用中文,被迫进入了清一色的日文世界”<sup>[2]</sup>。“清一色”的提法,首先强调了日据台湾后期“仅此一家”的一元文学语言生态,即有且仅有“日语”一种文学语言作为文坛通用语;其次则暗示了“日语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即在日据台湾后期的文学场域中日语创作蔚为大观、成果纷呈。的确,在日据台湾文学生态体系中,自始至终“日语”都在不断挤压中文的存续空间,并以废止1937年中文“报刊栏”为标志确立了自身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地位并非绝对牢靠,更不会是全然“清一色”而无其他异质声音的“日文世界”。从1937年废止中文“报刊栏”以后,汉文为语言载体的通俗文艺杂志《风月报》(1941年改名《南方》)在台湾仍旧获得许可发行<sup>[3]</sup>,挑战了“清一色的日文世界”的说法,证实了虽然在一个“日语”居主流的文坛中,仍有其他文化势力的存在;此外,尽管台湾的日语作家被驱使着使用日语来创作,他们用日语创作的事实被殖民者视为了台湾“日语世界”确立的标志,但是细考台湾日语作家的文学语言能力,则能确定这种“日语优越性”的论述逻辑之不可靠。日据台湾后期,日语的确是文学语言介质中的重要一元,但它从未完全泯灭台湾人的母语意识,“日语台湾化”的中介语形态创作的出现,即证明了这一点。

#### 四、余 论

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相较于殖民地朝鲜更为成功的“国语运动”以及“日语普及”,的确连带地使得193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坛形成了日语占优势的创作风向,并且作家们都有着向日本“中央文坛”进军而获得肯定的考量。但“日语优势”的创作生态决不意味着台湾的日语文坛的构成形态需要袭用日本本国文坛的判断标准,或者研判台湾作家日语创作时需要以日本本国的日语作家创作作为参照体系。尽管台湾作家用着殖民者的“日语”,在表面上参与着日语文学的建设大业,但在实际上台湾作家那充满异质、受到母语迁移作用而产生、在日本殖民者看来充满缺点的“不标准日语”,却以自身的存续,不断削弱、瓦解这种“标准日语”的优势地位。无论是日本“中央文坛”还是台湾本岛文坛内部,在其时日据台湾诸多评论家不断对台湾作家日语文学能力的分析、研判中,固然指出了一个语言学上“二语习得”以及运用的偏移问题,但在文学/文化议题上,这个现象的根本在于呈现出了彼时文学生态中,强调有一个“标准日本語”的判断旨归。但所谓的“规范的/欠佳的日语”的标准提出,无疑折射出一种殖民主义的“语言态度”,它将殖民者的标准强加于被殖民者,并通过各种文学制度(文学评奖、

[1]刘捷:《台湾文学鸟瞰》,载《台湾文艺》第1卷第1号,1934年11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1册,第115页。

[2][日]下村作次郎:《从文学读台湾》,邱振瑞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3][日]河原功:『『風月報』復刻にあたって』,载河原功监修《风月·风月报·南方·南方诗集 总目录·专论·著者索引》,〔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版,第1页。

文学生产)不断激活它、鼓励它,使得殖民地台湾的作家无时无刻面对着来自文学语言上的挑战。但如果以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台湾日语作家用这种所谓的“欠佳的日语”、“尚待打磨的日语”所进行的文学书写,未尝不是一种“中介语文学”,它以“中介语”的存在方式以及文学形态,在无形中反抗着“好的日语”的文化霸权地位,它以自身书写的完成以及存续,挑战着时人对它的价值偏见。在当时的评论家眼里,这些创作无疑只是一种过渡品,日本本岛无不期待台湾作家提升日语能力,进而领会日本精神,最终迈入真正的“日本人”序列。如日人西川满就放言,“我们日本甚至被称为言灵赐福的国度,拥有着无以伦比的美妙国语。既然是日本人,就无论如何都要学会这美妙的国语,……学会基础国语的各位本岛人,可不能这样就心满意足。希望你们还要进一步学到文学素养,可以不用理性,而用日本人的直观去感受世界的指导理念——日本精神。”<sup>[1]</sup>

但台湾作家对这样的理念未必赞同。对于按照这种殖民主义的“语言态度”要求磨砺以及提升日语语言能力的倡导,台湾作家也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在暗地里兀自反抗。张文环在随笔《规定的课题》(1936)里,非常婉转地表示将自己的日语能力升段到“好的日语”的层面,不是他文学创作接下来会前进的方向;恰恰相反,他对打磨日语“美感”则抱持了警惕之心:“我早就认为,我应该早一点放弃最初一定要面临的文学问题,选择一个方向,全心投入,努力去做。我想,当然不能被日本语的美感和优点吃定,就算把那种美感破坏到某一点,也要让文章熟练到能表现自己生活内涵的必要程度,这才是正确的做法。”<sup>[2]</sup>扎根于现实,而让现实本身呈现出“生活内涵的必要程度”,是台湾的日语作家在创作中优先考虑的事实。在日人作家眼里台湾作家日语能力的“创伤”,在台湾作家自己的书写生态中,它其实是植根于社会现实的文学存在,它的表现手段、形式——文学语言,不必也不能以“标准日语”的仿制品的姿态聚像成型。

[责任编辑:平 啸]

## The Rea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aiwanese Writers' Writing in Japanes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Ma Taixiang

**Abstract:** Top Taiwanese Japanese writer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the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Literature Award” in Japan since the 1930s, which is considered by quite many researchers evidence of Taiwanese writers' good command of the colonist language.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reality of the award shows that those writers' ability of literary expression in Japanese. The analysis firstly reveals that Japanese popularization seemed fruitful, but the effect is actually limited; secondly, it displays the unequal lite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 and the colonial one; lastly, it also proves that the overstatement of the absolute dominance of Japanese in Taiwan literary circl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does not hold water.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Taiwan Japanese Literature; Lv Heruo; Zhang Wenhuan; Long Yingzong

[1]西川满:《让文学也普及到邻组——自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归来》,《新建设》第2卷第1号,1943年1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4册,第20页。

[2]张文环:《规定的课题》,载《台湾文艺》第3卷第6号,1936年5月,译文参见黄英哲主编《日治时期台湾文艺评论集(杂志编)》第2册,第43页。